

資治通鑑

【注释本】

周国林◎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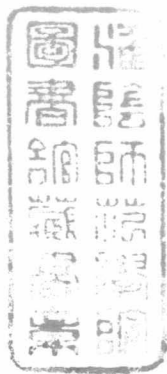


1415555

周国林◎主编

資治通鑑

【注释本】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415555



岳麓書社

注释人员简介

(以注释先后次序排列)

李国祥 广东省梅县人,1934年12月25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曾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。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研究,参与编撰出版的论著有《古籍整理研究(八种)》、《国学知识指要》、《尚书选译》等。本书注释第1~12卷。

姚伟钧 湖北省武汉市人,1953年8月4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》、《世界主要文化传统概论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13~27卷。

汤建英 湖北省黄梅县人,1932年1月25日生。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。长期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。1978年调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。与人合编《明实录类纂》中《人物传记卷》、《北京史料卷》、《广西史料卷》、《涉外史料卷》、《宫廷史料卷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28~43卷。

王玉德 湖北省武汉市人,1954年4月30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》、《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》、《发生与交融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44~57卷。

谭汉生 湖南省双峰县人,1958年5月22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著有《春秋韬略》、《儒家立身之本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58~74卷。

周国林 湖北省枝江县人,1953年5月3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》、《中华大谋略》、《大唐西域记注译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75~118、226~240卷。

刘韶军 山东省莱州市人,1954年3月28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太玄校注》、《太玄集注》、《儒家学习思想研究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119~144卷。

高华平 湖北省监利县人,1962年6月27日生。南京大学文学硕士,武汉大学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》等书七部,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。本书注释第145~155卷。

董恩林 湖北省阳新县人,1956年11月6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唐代老学: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》、《唐代〈老子〉诠释文献研究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156~166卷。

陈蔚松 湖北省枝江县人,1944年1月17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。著有《汉代考选制度》、《李贽文选译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167~184卷。

庞子朝 河南省新野县人,1935年10月17日生。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,古汉语讲师。1983年后,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



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。与人合著《三网集》，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。本书注释第185~199卷。

杨昶 湖北省武汉市人，1948年9月29日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。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。著有《勉行集》、《国学知识指要·辨伪学讲义》、《中华测字术》、《神秘文化典籍大观》、《占候解读》、《出土文献探赜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200~213卷。

张三夕 湖北省鄂州市人，1953年9月30日生。南京大学文学硕士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。曾在湖北大学中文系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、海南大学文学院等校任教。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批判史学的批判》、《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》、《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》等书。本书注释第214~225卷。

崔曙庭 湖南省宁乡县人，1926年4月生。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，留校任教，后被聘为研究员，一直至1988年退休。主要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，参与注释和翻译二十四史和《资治通鉴》等古籍多部，著有《历史文献研究论丛》一书。本书注释第241~254卷。

顾志华 浙江省宁波市人，1945年1月22日生。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，南京大学文学硕士。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。合著有《中国史学名著题解》、《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》、《李贽文选译》等。本书注释第255~268卷。

李晓明 安徽省淮南市人，1958年11月生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、中国史学史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，著有《唐诗历史观念研究》、《〈晋书〉志文校勘拾遗》、《唐修〈晋书〉志文考辨》、



前言

(一)

中国古代史部书籍,对社会发生长久影响,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的,早期的当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一千一百多年后,则有宋代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问世。要了解《资治通鉴》(以下简称《通鉴》)这部书,得先从司马光这个人说起。

司马光(1019—1086),字君实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人。他出生于宦宦之家,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。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,官至三司副使、天章阁待制。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),司马池做光州光山(今河南光山)知县时,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,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。

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,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。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引述他的话说:“书不可不成诵,或在马上,或在中夜不寝,时咏其文,思其义,所得多矣。”学问增进后,文章也写得古朴醇厚,有西汉的风格。二十岁时,便考中了进士。不久,父母先后亡故,他服丧数年。除服后,入京为官。仁宗末年,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英宗(1064—1067年在位)时,进位龙图阁直学士。神宗(1068—1085年在位)即位后,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御史中丞。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,司马光极力反对。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,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,便退居洛阳,六任冗官,达十五年之久。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,太皇太后高氏听政。高氏不满新法,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,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。司马光大行其道,废除新法,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,

成为际会风云、左右时局的人物。去世后，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，追赠他为太师、温国公、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。

然而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，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，而是他的学术事业。不过他的政治经历，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，是不无益处的。

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，是在仁宗嘉祐（1056—1063）年间。有感于《春秋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，从《史记》到《五代史》的纪传体史书，长达一千五百多卷，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，毕世不暇举其大意，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、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，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，名为《历年图》。后来，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《通志》。《通志》的上限，不始于上古，而始于战国，其用意在于上接《春秋左氏传》。《左传》叙事至智伯之事止，《通志》托始于魏、赵、韩初命为诸侯一事，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，正好与《左传》衔接。《通志》进奏英宗后，引起重视。英宗下令司马光“编修历代君臣事迹”，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。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，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，自行选择协修人员。神宗即位后，司马光进读《通志》，神宗以其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且写了一篇序文，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。

书局设立后，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攽（1023—1089）、刘恕（1032—1078）和范祖禹（1041—1098）。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，各自负责一个时段资料收集。他们遍阅旧史，并旁采诸家传记，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，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，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：“《资治通鉴》之成书，盖得人焉。《史记》、前后《汉》则刘贡甫（攽），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（恕），唐迄五代则范纯甫（祖禹）。此三公者，天下之豪英也。”

资料汇集后，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。司马光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，说自己“研精极虑，穷竭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……抉撙幽隐，校计豪厘”，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”，是一点也无夸张



的。《通鉴》以“资治”为目的,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。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“宁失于繁,毋失于略”,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,相当费心,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,司马光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,才定稿为八十一卷。更费心力的是,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,文笔各有不同,要依照统一的体例、风格加以编排,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。人们常说,《通鉴》写得好。事实上,主要不是“写”得好,是“编”得好。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,稍加润色,起承转合,使其浑然一体,如出一手,这是真正的大本事。金毓黼先生《中国史学史》曾取《通鉴》与荀悦《汉纪》相比较,说:“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,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,而与《汉纪》之面目则大异,盖取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,徐徐自出手眼,冶于一炉,创为新作。试取其书观之,无一语不出于《史》、《汉》,而无一处全袭《史》、《汉》。非特前汉为然,全书无不如此,所谓剥肤存液,取精用宏,神明变化,不可方物者,非《通鉴》一书不足以当之,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。”

《通鉴》也有“写”得好的地方,那就是他的史论。对各种人物和事件,司马光有所感触,便以“臣光曰”起头而发表评论,长者千余言,短者数十字,无不苦心孤诣,戛戛独造,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、社会观和史学思想。全书中,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。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,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。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,但却绝无凿空立论、无病呻吟之弊,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。

(二)

经过十九年的努力,《通鉴》修纂完毕。全书二百九十四卷,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),终于后周显德六年(959),按照周、秦、汉、魏直至后周的次序,记载十六代、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。全书体大思精,网罗繁富,虽笔削甚严,仍达三百万言。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、生民休戚,尤其是善可为法、恶可为戒的大事,尽载入书中。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,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、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。

《通鉴》的修成，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。本来，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，但自从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“正史”地位后，编年体渐趋式微。《通鉴》一出，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。以《通鉴》的补编、续编而言，较著名的便有刘恕的《通鉴外纪》、李焘（1115—1184）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（1164—1242）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徐乾学（1631—1694）的《资治通鉴后编》、毕沅（1730—1797）的《续资治通鉴》和夏燮（1800—1875）的《明通鉴》。诚如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所言：编年体得《通鉴》之助，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，坠绪复续，厥功伟哉！”

由于《通鉴》内容浩博，叙述史实前后相隔，南宋人袁枢（1131—1205）有感及此，将《通鉴》史实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事目，依次叙述每个事件的经过，编纂成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以便观览。结果“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”，为读者了解史迹的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，开了新途径。这完全是受《通鉴》之益，成为“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”的典型，无意中创立出以事件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来。此体一出，又催生出从古代到晚清的多种纪事本末体史书。至于朱熹据《通鉴》而作《纲目》，派生出纲目体来，也多少对史学影响的扩大起了些作用。

《通鉴》的修成，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。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，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，获得智慧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，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，因而潜心研习。宋代学者中，洪迈曾经手抄《通鉴》三遍，张仲隆以“通鉴”名其书斋，王应麟为《通鉴》撰《答问》，称“自有书契以来，未有如《通鉴》者”。倪思则在其《经钜堂杂志》卷二中，把《通鉴》和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相提并论，说：“《易》以明天地万物之理，《通鉴》纪治乱兴亡之迹。推其理而知其盈虚，考其迹而究其得失，是其学也有用，其于用也，斯为有益。予昔之学贪多务得，余今之学捐华摘实。手此二书，朝夕绌绎，迨其久也，怡然理会，涣然冰释，寂然不动，退藏于密。”他们对《通鉴》的尊崇，已近乎神化了。元初，胡三省为《通鉴》作注，《自序》说：“为人群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；为人臣



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上无以事君，下无以治民；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谋事必至于辱先，作事不足以垂后。乃如用兵行师，创法立制，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，鉴古人之所以失，则求胜而败，图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。”这是就《通鉴》的功能而言。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写出了传世之作《读通鉴论》，其《叙论四》在书名上做文章说：“旨深哉！司马氏之名是编也。曰资治者，非知治知乱而已也，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。”“鉴者，能别人之妍媸，而整衣冠，尊瞻视者，可就正焉……故论鉴者，于其得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得；于其失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失。其得也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，其失也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，乃可为治之资，而不仅如鉴之徒县（悬）于室、无与炤之者也。”“其曰通者何也？君道在焉，民情在焉，边防在焉，臣谊在焉，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，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。虽扼穷独处，而可以自淑，可以诲人，可以知道而乐，故曰通也。”后来，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：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。”凭着这样的共识，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，《通鉴》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《通鉴》学。

《通鉴》详于政治和军事，历代政治家、军事家对《通鉴》的痴迷程度，绝对不低于学者。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《通鉴》：“其所载明君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以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……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，册牘之渊林矣。”后世政治、军事史上的人物，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、现代史上的毛泽东，他们毕生钻研《资治通鉴》，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时之得失，其认识之深刻，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。曾国藩认为，六经以外另有七书，能通其一即为成学，《通鉴》即为七书之一。他在《与罗少村书》中说：“窃以先哲经世之书，莫善于司马文正公《资治通鉴》。其论古皆折衷至当，开拓心胸。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，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，因蜀汉而论正闰，因樊英而论名实，皆能穷物之理、执圣之权。又好

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，脉络分明；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，使士大夫怵然知戒，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。”毛泽东熟读《通鉴》，重在一个用字。他曾对史学家吴晗说：“《资治通鉴》这部书写得好，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，但叙事有法，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，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，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。”他还亲自过问《通鉴》的古为今用之事，把校点《通鉴》的任务，交给吴晗组织力量去完成。总之，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，《通鉴》是史书，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。他们从《通鉴》中吸取政治智慧、军事谋略，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。“历史”通过他们之手，和现实发生关联，可谓《通鉴》“资治”之极致！

自然，《通鉴》也不是没有瑕疵的。近人张煦侯的《通鉴学》，曾从编纂学的角度论及《通鉴》得失，以为其得在合纪传表志而为一编，合独断考索而为一手，合史学文学而为一家人，而其失亦有三大端，即系年方式之过整，文化史料之太略，作者情感之或偏。不偏不倚，可谓公允的评论。善读书者，自可取其长而避其短。

(三)

历史上有价值的著作，总有注释之作出现。司马光的门人刘安世曾撰《音义》十卷，世已无传。南宋时期，有所谓司马康的释文，因刻于海陵，世称“海陵本”，属伪托之本。另外，还有史炤的释文，以及蜀州广都费氏的《通鉴音释》。宋元之际，胡三省用数十年工夫为《通鉴》作注，成为最佳注本。胡三省发扬司马光“考异法”的治学精神，对《通鉴》史文进行了一次考订，使注释工作立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。注释中他指出了前史及其前人注释中的不少错误，引用大量材料对《通鉴》史文作了补充和解释，使史文更加明晰。地理方面，对地理位置、沿革析置、兵事设险、政治更动、租赋收纳之类，注释相当丰富。文字音义的训释数量大，且有不少独到之处，把古音、今音、字义以及方言解释得一清二楚。可以说，这是今日阅读《通鉴》时最值得关注的古代注本。

不过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用当代语言加以注释，或许更便于



他们阅读。为此,我们曾于20年前有过注译之作。现在,应岳麓书社之约,我们将当时的注释加以修订,以应社会的需求。工作过程中,我们比较重视历史典故、地理沿革、事件因果、关键人物、疑难字词的训释。对一些难认的字,还加以注音。这些,都是试图为读者扫除一些阅读过程中的障碍,读懂这部史学经典之作。

《通鉴》问世后,刊本较多。就宋本而言,有所谓十二行本,甲、乙十五行本,十四行本,甲、乙十六行本,甲、乙十一行本,传校北宋本,达九种之多。明代刊本,孔天胤本较为知名。我们本次注释,底本采用的是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。一是因为该本为精校本,二是因为有中华书局的成果可以借鉴。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高度关心古籍整理事业,《通鉴》是国家组织人力校点的第一部大型古籍,达到了较高水准,至今仍值得信赖。这在学术界,当无异议。

注释过程中,各人注释风格和重点不尽一致,有些词语因翻检不便,而前后皆出注,想必读者对此是可以接受的。当然,限于水平,注释中存在着不准确甚至不妥之处,则是需要在今后改正的。因此,恳请读者不吝赐正,以供修订之用。

周国林

2009年12月于武汉桂子山

资治通鉴序 御制

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《书》亦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。”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，存王道之正，垂鉴戒于后世者也。

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匱之书，据左氏《国语》，推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采经摭传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驰骋上下数千载间，首记轩辕，至于麟止，作为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，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。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，褒贬出于至当，则良史之才矣。

若稽古英考，留神载籍，万机之下，未尝废卷。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俾就秘阁翻阅，给史史笔札，起周威烈王，迄于五代。光之志以为周积衰，王室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平王东迁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桓、文更霸，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；威烈王自陪臣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周虽未灭，王制尽矣！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。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四卷，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、册牒之渊林矣。

荀卿有言：“欲观圣人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”若夫汉之文、宣，唐之太宗，孔子所谓“吾无间焉”者。自余治世盛王，有惨怛之爱，有忠利之教，或知人善任，恭俭勤畏，亦各得圣贤之一体，孟轲所谓“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”。至于荒坠颠危，

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，奉圣旨读《资治通鉴》。其月九日，臣光初进读，面赐御制序，令候书成日写入。



进书表

臣光言：先奉敕編集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，今已了毕者。

伏念臣性识愚鲁，学术荒疏，凡百事为，皆出人下，独于前史，粗尝尽心，自幼至老，嗜之不厌。每患迁、固以来，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，读之不过，况于人主，日有万机，何暇周览！臣常不自揆，欲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，私家力薄，无由可成。

伏遇英宗皇帝，资睿智之性，敷文明之治，思历览古事，用恢张大猷，爰诏下臣，俾之編集。臣夙昔所愿，一朝获伸，踊跃奉承，惟惧不称。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，于崇文院置局，许借龙图、天章阁、三馆、秘阁书籍，赐以御府笔墨缣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，以内臣为承受，眷遇之荣，近臣莫及。不幸书未进御，先帝违弃君臣。陛下绍膺大统，钦承先志，宠以冠序，赐之嘉名，每开经筵，常令进读。臣虽顽愚，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，陨身丧元，未足报塞，苟智力所及，岂敢有遗！会差知永兴军，以衰疾不任治剧，乞就冗官。陛下俯从所欲，曲赐容养，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，前后六任，仍听以书局自随，给之禄秩，不责职业。臣既无他事，得以研精极虑，穷竭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牍盈积，浩如烟海，抉摭幽隐，校计豪厘。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修成二百九十四卷；又略举事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，为目录三十卷；又参考群书，评其同异，俾归一途，为考异三十卷：合三百五十四卷。自治平开局，迨

今始成，岁月淹久，其间抵牾，不敢自保，罪负之重，固无所逃。臣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。

重念臣违离阙庭，十有五年，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朝夕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！顾以弩蹇，无施而可，是以专事铅槧，用酬大恩，庶竭涓尘，少裨海岳。臣今骸骨癯瘠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。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，察其愿忠之意，以清闲之宴，时赐省览，监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懋稽古之盛德，跻无前之至治，俾四海群生，咸蒙其福，则臣虽委骨九泉，志愿永毕矣。

谨奉表陈进以闻。臣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
官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

司马光上表

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

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

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

同修秘书丞臣刘恕

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

編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

第一册目录

资治通鉴序(御制)	(001)
进 书 表	(003)
卷 第 一 周纪一	(001)
卷 第 二 周纪二	(021)
卷 第 三 周纪三	(043)
卷 第 四 周纪四	(062)
卷 第 五 周纪五	(082)
卷 第 六 秦纪一	(100)
卷 第 七 秦纪二	(121)
卷 第 八 秦纪三	(139)
卷 第 九 汉纪一	(155)
卷 第 十 汉纪二	(169)
卷 第 十 一 汉纪三	(182)
卷 第 十 二 汉纪四	(196)
卷 第 十 三 汉纪五	(212)
卷 第 十 四 汉纪六	(228)
卷 第 十 五 汉纪七	(243)
卷 第 十 六 汉纪八	(260)
卷 第 十 七 汉纪九	(279)
卷 第 十 八 汉纪十	(295)
卷 第 十 九 汉纪十一	(313)
卷 第 二 十 汉纪十二	(331)
卷 第 二 十 一 汉纪十三	(348)
卷 第 二 十 二 汉纪十四	(366)
卷 第 二 十 三 汉纪十五	(380)